

嚴耕望先生傳略

廖伯源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嚴耕望先生，字歸田，安徽桐城人，民國五年元月二十八日生。¹祖上從江西遷安徽，居縣南數十里之羅家嶺，家世務農。父親裕榮公未曾讀書，然深明事理，為人公正，見重於鄉黨，常為鄉人評論是非，裁斷曲直。母徐氏，育四子一女。長子德明，曾讀私塾，稍通文墨，二子、三子亦曾入學，及長，務農工。先生為幼子，本名德厚²，裕榮公為其取小名耕旺，蓋期望其長大後勤於稼穡。及先生入中學，始更名耕望。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只要家中有人力，克勤克儉，就能慢慢成為小康之家。先生之家庭亦如是：父兄勤於農事，兼作手工業，母勤儉持家，其後長兄且兼營商業。經濟狀況漸佳，故先生得以進學。

先生初讀私塾，後就讀於故鄉之羅家嶺小學、省城安慶之安慶第一中學、安慶高級中學、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大學畢業後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二年。

先生在小學、中學都長於數學，國文則平平，羞以作文示人。長兄明德先生常來信，屢勸先生注重國文，在文章上用些功夫；先生因此立志學好文章。當時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風行，先生讀而好之。又前曾讀過《三國演義》，深為其故事所吸引，乃進而讀《三國志》。此為先生所讀之第一部正史，多不解之處，乃查字典強讀。先生為提高國文程度而讀史書，慢慢養成對歷史之愛好。

民國以來，社會上重理工而輕文史，資質佳的學生絕大多數投考理工科系，自問無能力讀理工的，才退而求其次，進入文史科系。先生在中學時代長於數學，卻選考歷史系，可謂是少數之例外，必定是在中學時已培養了對歷史的強烈興趣。此蓋受高中歷史老師李則綱之教導影響甚大。李則綱是先生之小同鄉，安徽桐城人，利用人類學及唯物史觀治中國古史，為安慶高中之中國歷史科教師，又在安徽大學兼課。先生在安慶高中讀書時，李則綱「已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史學通論》、《始祖的誕生與圖騰》兩書。第二部書可能為中國學人運用人類學上的圖騰觀念解釋中國史前史的一部最早著作。」³先生在中學時不但讀了不少史書，而且讀了不少人類學民族學方面的書籍。還受人類學家莫爾甘（L. H. Morgan）所寫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的影響，寫了一篇文章：〈堯舜禪讓問題研究〉，認

¹嚴耕望先生之正確生年是陰曆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陽曆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先生出外讀書工作，填寫履歷，年份填陽曆之五年，日期則填陰曆之月日，日後各方名錄多作五年十二月，或作四年正月，俱錯誤。

²此為嚴先生晚年之得意門生李啟文兄告知，李兄隨侍先生逾十年，親聞之於先生。

³參見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43-44，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一年。

爲堯舜禪讓只是部落聯盟領袖的選舉。中學畢業時，先生的志願是日後利用人類學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此皆可見李則綱影響之痕跡。先生之大學同學錢樹棠且謂：先生之「粗知治史門徑，由李則綱啓迪。」當時廣州之中山大學，其人類學、民族學科系較爲有名，先生投考大學時，本以中山大學爲第一志願。但到武漢的珞珈山，看到武漢大學的校舍宏偉壯麗、幽靜自然兼而有之，臨時改變主意，以武漢大學歷史系爲第一目標。⁴先生得入大學，靠考取安徽省公費，每年可領取百餘元。⁵

進入武漢大學之後，卻僅在珞珈山讀書三月，因爲戰事關係，學校西遷四川省樂山縣。先生之大學生活，有三年半是在四川樂山度過，民國三十年夏畢業。

大學四年大概是先生一生中最高飛跳脫的時代。進了有興趣的科系，並選讀法學院課程「政治學」、「經濟學」及中國文學系之文字、聲韻、訓詁等課程，擴大了社會科學知識基礎，增強了閱讀古書的能力。根柢既深厚，又以勤力用功，學業得心應手，甚受同學、老師的器重。同班同學錢樹棠與先生最爲友好，同學稱兩人爲兩個「書櫥」，意謂只識裝書、不知世故。兩人讀書認真，對不稱職之教授，也敢於批評，甚至挑剔。系主任方壯猷曾在課堂上憤憤地說：「袞袞諸公十年後都將是大學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⁶

有一次，學校請了一位頗有名氣的老教授來教秦漢史及三國史，該教授於舊文學或有所長，實不治史，又妄自尊大，視大學生如童蒙，僅依據紀事本末一類史籍講述史實，既無新意，且錯誤不少。兩堂之後，先生寫了一篇文章，指出該教授的錯誤十餘條，加上錢樹棠所撰、全班同學簽名的呈文，送呈校長。王撫五校長看了呈文及摘謬後，說史學系有人才。那位教授就此離開。⁷這種不畏權威的精神發展過度，就會做出荒唐事。到四年級時，先生與錢樹棠覺得學校高層人事名氣不足，畢業證書由他們簽名，不夠光彩，乃同赴校長寓所呈文，請求聘朱光潛爲教務長。爲王撫五校長訓斥一頓，廢然而返。先生中年以後，全無火氣，總是溫文沉默，除了讀書著作，似對什麼事情都不關心。上面的故事若非先生自己寫出來，真不相信事實。幾十年的讀書生活，使先生的性格都改變了。

先生很早就養成蒐集資料，寫卡片之習慣，「大學三年級之際，即著手編寫秦史，從秦族初興到秦朝滅亡，認爲材料少，又較集中，容易成事。」⁸收集之資料有二十多萬字，但因先秦史之史料太少，研

⁴參見前引：《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一〈我與兩位王校長〉，頁141。

⁵參見錢樹棠先生之文章：〈紀念嚴耕望學兄〉。

⁶參見前引：《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一〈我與兩位王校長〉，頁147。

⁷參見前引：《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一〈我與兩位王校長〉，頁147。

⁸參見錢樹棠先生之文章：〈紀念嚴耕望學兄〉。

究必須利用大膽想像與揣測，結論之可靠性又太低；先生發覺治先秦史與其性格不合，故放棄此項計劃。從高中畢業時，志願日後利用人類學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到大學三年級放棄秦史的研究，可見先生之治史計劃從虛到實之過程。其後先生研究之範圍移到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蓋以此時期之史料數量適中，不太多亦不太少，研究不必依靠想像與揣測，憑一人之力可讀完全部史料，可以較放心的作結論。

大學三年級上學期，耕望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寫成〈中國軍事地理形勢之今昔〉」，二月之後，於二十九年元旦又寫成〈楚置漢中郡地望考〉。⁹

民國三十年春天，先生在武大讀書之最後一學期，錢穆先生到武大講授「秦漢史」與「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兩門課凡四十餘天。時先生正在撰寫畢業論文〈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錢先生所開兩課，都與先生之論文有關，故先將寫好的兩章呈請審閱。錢先生後召問先生，並垂詢其他讀書之問題，深感滿意。當時錢先生曾在講壇上說：制度與歷史地理是講歷史的兩隻腳，這正是先生已有興趣的兩方面。制度史的興趣是從陶希聖所著的《秦漢政治制度史》所引發。¹⁰對於地理學之興趣則始於小學時代，其長兄德明先生所送之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分省地圖集。先生非常喜愛此地圖，常常翻閱揣摩，一直帶在身邊。初中時常讀地理書，高中時代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深喜其縱論兵略。所以在未識錢先生之前已曾撰寫〈楚置漢中郡地望考〉等文。此時聽到錢先生這番話，大受鼓勵，終身從事歷史研究之決心更為強烈。

錢先生對先生一生的影響尚不止此。先生大學畢業時，打算在樂山附近謀一中學教職，突然收到錢先生的來信，囑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去做研究工作。當時國學研究所主任是顧頡剛先生，錢先生是導師。後顧先生到重慶主持文史雜誌，錢先生繼任主任。研究所之規模甚小，老師、學生一同生活、讀書，了無隔膜。一夕，先生以舊稿〈楚置漢中郡地望考〉呈錢先生審閱，錢先生極為欣賞，許為歷年所教諸生中之最有希望者。錢先生為史學名師，歷任著名大學教授，有此評語，對先生的學術意志必有極大鼓舞作用。國學研究所每兩週舉行一次講論會，錢先生就諸生所講問題作評論，多有啟發性，先生自謂得益匪淺。得益更大者，為每天飯後跟從錢先生散步，聆聽錢先生隨意談話，亦可隨意說出自己所見

⁹參見前引：《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47。

¹⁰先生自高中時代就喜歡讀《禹貢》與《食貨》兩種半月刊，並讀過陶希聖所著《秦漢政治制度》，甚感興趣。但覺得「地方制度」一章太粗略，後讀了些石刻史料，認為可以用來研究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乃以此為大學畢業論文之題目。走上研究制度史之路。（參見《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之「本卷書成後記」）

所思，請示教益。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兩年，先生大部份時間用在研究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兩漢太守刺史表》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的初稿，都在此時完成。

三十二年秋，因校董會內部糾紛，人事改組，波及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幾於停辦，錢先生介紹先生到四川大學做研究生。三十三年春，先生以裕榮公年近八十，想回安徽老家省親，因接受了安徽學院的講師聘書。由成都啓程，但走到重慶，因中原戰事復起，交通阻塞，不得不在重慶停留下來。顧頡剛先生介紹先生到北碚修志委員會做事。該委員會只有兩名工作人員，傅振倫爲主任，先生爲編輯員兼打雜，工作無法展開，先生自謂此爲其一生最不得意的時期。但在到達北碚的初期，住在顧先生所主持中國史地圖表社的宿舍，認識了該社工作人員段畹蘭女士。段女士是成都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兩人由此相戀，後結爲夫婦。不久，先生轉到北碚附近之金剛碑工藝班任國文教員，〈秦漢郎吏制度考〉之撰寫即在此時進行。先生回憶謂一夕大雨穿牆而過，先生赤腳憑几，伏案撰寫此文。¹¹

此時期段畹蘭女士及其母親已依先生生活。¹²抗戰後期，學界人員之物質生活條件甚差，名教授陳寅恪尚且營養不良；先生大學畢業不久，在非正式之中學教書，其窮苦可知，此所以先生數十年後仍常對其學生說此時期之苦況。更使先生不安者，爲教書課業太多，無暇讀書研究，似乎前途茫茫。

段畹蘭有一好友曾祥和小姐（日後之沈剛伯夫人）謂曾聞於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脾氣梗直，聘任研究人員以能力爲標準，不重介紹人。先生極欲覓一可以讀書研究之工作，乃毛遂自薦，寄信傅所長，申請入史語所作研究工作，隨信附上三篇論文（有已出版與未出版的）。信是三十四年七月中旬寄出，因爲無人介紹，故對成功並不抱什麼希望，不過盡人事而已。誰知八月二十一日，收到傅先生一封掛號快信，謂歡迎先生到史語所工作，又謂依先生之論文程度，當爲助理研究員，但論資歷只能聘作助理員。數十年後，先生對其學生說起往事，謂他當時完全不知道中央研究院有何職級，只要有可以讀書之環境，給他什麼職位他都會接受。

收到傅先生回信的第二天，先生就到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去見傅先生。「那時抗日戰爭剛剛勝利結束，他非常忙，那天晚上大約十點鐘以後纔回來。」¹³時先生家住北碚，到重慶去見傅先生，當是從

¹¹見〈秦漢郎吏制度考〉附記二，《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383-84，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年。所謂大雨穿牆而過，蓋牆壁是編竹爲籬，加以泥塗粉刷。

¹²出處同前注。

¹³見嚴耕望先生：〈我對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此文初刊《仙人掌雜誌》第一號，台北，民國六十五年，標題爲〈我對傅孟真先生的感念〉），載前引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二，頁154-155。

早上就去，因為沒有約定，等到晚上十點以後纔見著傅先生從外面回來。見完傅先生後又不知如何回家，當時求人找事之難與先生欲入史語所之熱切，可想而知。

傅斯年先生初見先生，問完話後，希望先生暫時留在重慶，幫他處理文書事務，先生自以非幹事之才，下筆又慢，助理文書必做不好；而進史語所是為讀書研究，不想作文書事務。故坦率地推辭了傅先生交下的第一個任務。¹⁴此事可見先生之性格：不輕易許諾。此亦先生處世與人無嫌隙的原因之一。蓋輕易答允，以為不得罪人，實則日後不符所望，得罪更大。先生不輕易答允人，正常人都會體諒，最多以為不夠朋友，而不必為實現諾言為難自己、防礙自己之工作。此所以先生除少數深交外，朋友甚少，與多數史學界人士都只有淡如水之交情。先生之不輕易答允人，對邀請演講，常堅辭不應。在香港新亞研究所的課堂上，先生勉勵學生不要以外務防礙研究工作，謂邀請演講的人都是慕名而來，若答應一個，其他就難於推辭，日後不勝其煩。不如一個都不答應，以後都不會再來邀請。所以在台灣先生除了在史語所演講外，所外之演講，一概推辭。七十歲以後，大概覺得應多提攜後進，而老學生來請，也不好推辭，故間中亦到大學演講，然一年亦不過三數次。

先生入史語所，為一組之助理員，¹⁵初在四川南溪縣李莊之板栗坳史語所臨時所址上班。民國三十五年冬，史語所復員南京；三十八年春，史語所遷台灣，先生攜妻小奉岳母隨所遷徙。抗戰後幾年及遷台初期，生活極為艱苦，中央研究院為國家機關，其人員衣食尚可無虞。先生為人很能安貧，物質慾望甚低，每日讀書研究，研究範圍從漢代地方制度擴展到漢代至唐代政治制度史，更開創另一新的研究領域：唐代人文地理的研究。職級由助理員累升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至研究員。並曾擔任國科會的研究講座。

先生在撰寫《唐僕尚丞郎表》過程中，「深感新舊兩部唐書各有優劣。新書體制完備，但文傷簡略，往往因文害意，釀成很多錯誤。舊書敘事詳盡，但因後期史料零落，比次每誤。」¹⁶先生撰《唐僕尚丞郎表》時，就發現《舊唐書》之錯誤不下六百條。清人沈炳震編《兩唐書合鈔》，合抄兩唐書為一編，但抄得不夠徹底，對兩書的謬誤摘發不多。所以先生想以《兩唐書合鈔》為底本，糾正錯誤，詳抄史事，又廣為徵引其他史料與前人之研究，為之注釋，以補兩唐書之不足。以後研究唐史，此新編較兩唐書更為有用可信。又先生自一九四六年始，「搜錄『唐代人文地理』材料，意欲從地理觀點研究隋唐

¹⁴參見嚴耕望著：《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二〈我對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頁155。

¹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組從事史學及文籍考訂等研究，研究人員分四級：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嚴先生初入所，以其學歷大學畢業，為助理員。

¹⁶前引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76。

五代人文各方面的發展情況。」¹⁷此兩項工作都是工程浩大，必須投入畢生精力與時間始克有成，決不可兩者兼顧。選擇何者，關涉此後之研究範圍與方向。一九五五年，錢穆先生來台，先生即提出此問題請教。錢先生以為兩者皆可作出大貢獻，但以畢生精力作史籍考訂，工作枯燥，必使心靈僵滯，不如研究歷史人文地理，探索思考人文之各方面問題，讀書有得，然後深究發揮，較為活潑有生氣。先生謂聽了錢先生此番話，立即決定放棄兩唐書的整理計劃，專心於歷史人文地理之研究，以後亦一直以為此抉擇正確。而作此決定是錢先生之啓發。¹⁸嚴先生如此說法，其實是過份強調錢先生的影響。¹⁹先生對「唐代歷史人文地理」之資料蒐集，自一九四六年已經開始，到一九五五年，已有九年多，快到可以撰寫之階段。而先生自讀小學時起，就對地理有興趣，「唐代歷史人文地理」是先生早就決定要做的研究。今以撰述《唐僕尚丞郎表》，發現整理兩唐書亦是為之工作一生的好題目，一時見獵心喜，故心意不定。先生一生，對物質欲望甚淡，而對研究工作，則貪念難息，²⁰研究計劃越做越大。然工作仍是按部就班進行，故即使無錢先生之指教，先生在完成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史之工作後，仍會開始《唐代交通圖考》之撰寫。後以到香港中文大學，暫時放下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迫不及待地考述唐代之交通路線。可見先生對「唐代人文地理研究」之興趣，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史卒因此不得完成。

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時期，為集中全力於研究工作，堅持不兼課²¹，「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活動；連學術會議也不主動的參加，……覺得花費的時間太多，所得不償所失。」²²連為補貼家用，寫些普及性之歷史文章以賺稿費亦盡量避免。先生研究工作之習慣，是每天都作，從不間斷，故無所謂星期六、日休息。史語所的老輩有一傳聞：謂總統蔣中正於某星期天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因為沒有預告，不見有人迎接，走到史語所找人，只見有一人上身赤膊出來，看了一下，又進去不見了。民國七十四年底，先生自史語所退休，返香港之前，友人錢行，有一史語所之年青人當面詢問先生，是否有其事。先

¹⁷前引|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77。

¹⁸此段文字根據前引|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的相關文字改寫。參見《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76-78。

¹⁹錢樹棠先生來示謂不同意此一看法，其言曰：「錢師的話所謂不使『心靈僵滯』，『較為活潑有生氣』云云實是錢師治學精神所注，嚴於此時持有領會。嚴於人文地理早有興趣是一事，聞錢師言而捨彼取此又是一事。蓋一經錢師啓迪，即悟應為有追求，又見一番進境也。」

²⁰先生自謂：「我常自己反省，覺得我非貪人，但對於學術工作卻很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當宏通，如此就不免隨時努力去做。從這一點看來，自愧仍非達人！」見嚴耕望：《治史經驗談》，頁158，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年。

²¹先生去香港之前，僅在台灣大學兼過二星期課。該課程由數位老師講授，每人講兩三星期。此為十餘年前先生親對余言者。

²²見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47。

生謂當時天熱，一人在研究室，故脫去上衣。

前謂先生不輕易答允人，今又舉一例。民國五十一年五月，王世杰接長中央研究院，時先生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二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剛出版不久，此為中央研究院遷台後出版的大書之一，王世杰甚為欣賞，約先生談話，乃知先生是武漢大學之畢業生。王世杰是武漢大學之第一任校長，武大規模皆其手創，對先生之研究成績，甚感快慰。以後多次約談，至為關懷照顧，後且超擢先生為國科會的研究講座。但先生對王世杰希望他做的工作，只要先生認為有礙其研究及非其所長，即不敢答允。嚴先生在〈我與兩位王校長〉寫道：

「就在民國五十一年七月，校長希望我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他願意全力支持；但我考慮結果不敢寫。因為當時我雖然是在寫《地方行政制度史》，但實際上興趣早已轉移到歷史地理方面去，要想兼顧兩方面實在不可能。而且我的寫作習慣，縱然只是一篇論文，立意至少在三、五年之前，慢慢搜集史料，然後一氣完成。要寫一部大書，限期完成，（向公家提出計劃一定不能太久。）我實在毫無把握。

後來校長希望由研究院領導，仿英國《劍橋歷史》寫一部《中國通史》。上古史部分已由李濟之先生承諾，領導編纂。至於中古史，因為我平日發表的論著不出秦漢至隋唐範圍，就目前研究院同人而言，我不能辭其責，所以校長要我領導中古史的編纂工作。這項工作無論做得好做得壞，只要編成，都可以享大名於一時，但我仍然不能體念他老人家這番美意，來擔負起此項任務。我之所以不敢負起此項責任，原因很多：第一，這項工作要集國內外很多學人來共同努力，而我毫無行政領導能力。我常說，我在學術研究方面是個『強兵』，但不是個『良將』。自己做工作，自信是個標準工作者，如果領導他人，不免有聯絡協調開會應酬及文書處理等麻煩，我平日書信日記都懶得寫，也常常幾天不說一句話，如何能做領導工作呢？

第二，集體工作本身就困難……以目前客觀環境，縱能勉強湊成，但內容勢必不能連貫一氣。不但不能一氣呵成，而且必將各持所見，矛盾重重，只能算是一部較有計劃的中古史論文集，不能算是一部中古史；所以到時縱能交卷，也等於沒有交卷。

第三，我自己的工作實在太繁重，照我多年來已定的計劃，非再寫三四百萬字不能解決，若再承擔另一重大工作的領導責任，實在非我的能力與精神所能負荷！

這次休假回院²³，校長又舊事重提，屢次告訴我『事在人為，並無不能解決的困難』；但我

²³民國五十八年秋至五十九年夏，嚴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學休假，返史語所一年。

仍然鼓不起那份勇氣。一項工作的開始就沒有信心，那將不可能會做好；如果現在勉強承諾，將來把錢用了，而拿不出滿意的成績，那將更辜負老人的知遇！所以終於在惶恐的心情下違背了他老人家的美意，這是我感到十分愧憾的！」²⁴

王世杰是先生的老校長，對先生關懷照顧，其接長中央研究院，欲由中央研究院領導編纂一套中國通史，有建立政績之意，屬意先生領導中古史部分，時先生年不及五十，亦是十分器重。然先生一直推辭不就，雖然非常愧憾不安，但始終不肯允承，可見先生之敬業精神與堅守原則，絕不降低研究之水準，而名利之成分完全不在考慮之列。

錢穆先生在香港辦新亞書院，早在史語所尚在楊梅之時，就托牟潤孫專程到楊梅邀約先生到新亞任教，先生以學問未成，不肯接受。新亞書院後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為成員學院之一。錢先生屢招先生到新亞書院任教，先生以為史語所乃做學問之天堂樂土，不肯離去。但後來因為李定一居中傳話有誤，造成嚴先生不得不到新亞教書之結果。李定一亦是錢穆先生的學生，在四川時曾隨侍錢先生，與嚴先生交情甚深。一九六三年秋，李定一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教，多次勸先生一齊去香港。一九六四年春，李定一寒假返台，又一次來邀先生，先生推辭謂現正撰寫「隋唐地方行政制度」，此部書寫好再去。這樣一部大書，若以先生撰《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為比，最少要好幾年時間才能完成，到時事過境遷，師友邀請到香港任教的壓力將化於無形。誰知李定一誤會先生意動，蓋前此相邀，都是直接拒絕；此次謂寫完一書就去，已無以前決絕。李定一回香港後報告錢先生，謂先生有意到香港任教。二月二十五日，先生收到錢先生二十一日手書，云「弟駕有來港之意，驚喜交并。」又云：「（新亞）研究所本欲增一導師名額，久欲延弟來任此職，而所請經費，至今尚未決定。」二十六日又收到錢穆先生二十四日手書，謂：

「已加緊再與港府²⁵商量研究所增一導師事，如獲通過，則務望弟決心前來，因穆即以延聘吾弟為理由，要求港府從早增此名額。如弟不來，使穆出言失信，此後遇其他交涉，將受影響。」

先生閱信，至為惶恐。因即上一函，並立即發一電報，請錢先生不要為其特向香港政府要求增

²⁴嚴耕望先生：〈我與兩位王校長〉（此文初刊《珞珈》第二十八期，國立武漢大學旅台校友會編，台北，民國五十九年），載《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一，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一年，頁154-155。

²⁵港府為香港政府之簡稱。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立，是集合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與聯合學院三私立學院而成，初時各成員學院仍保留若干獨立權力，香港政府另組大學總部以統籌。各成員學院有關預算之要求，如增加教師之員額，須大學總部批准。大學總部與各成員學院交涉時，代表香港政府之立場，故錢先生向大學總部要名額，謂與港府商量。

加導師名額。二十七日再上一函，詳細說明不能即時赴港任教之理由：一是王世杰院長深為器重，越資深研究員而超擢先生為國科會的研究講座，又要先生領導編撰「中國中古史」，先生推辭其事不久。在此情形下要離研究院到香港任教，太傷王院長之情。二是先生長子曉田已將滿十八歲，接近兵役年齡，出境也有問題。誰知二十九日復得錢先生手書曰：

「來電已悉，惟此間為申請研究所導師增名額事，獲得意外快速之成功。…務盼弟就此職名，千萬千萬。」

同時，先生又收到李定一前後兩信，云：

「賓師此次大費周章，始有此一缺；若兄不就，則賓師頗難過。」「此事賓師係硬向中文大學特要之導師，並鄭重申明，已有極佳人選。…如兄不來，則賓師不能下台。」

數日後，收到新亞研究所之聘書。先生曰：「事已至此，已無迴環餘地，若仍堅持不去，實在對不起二十餘年來心神俱契的恩師，所以赴港事不得不就此決定。」²⁶既不能不去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先生乃向李濟所長與王世杰院長說明不得不去之苦衷，得到兩位先生之諒解，並幫助辦理出境手續。而曉田出境，因距兵役年齡尚有數月，在法令上尚有可為，錢穆先生亦托人協助，得到批准。先生全家與岳母乃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尾到香港，先生原想教二年書後即返中央研究院供職，但以一子一女之學業，居港不滿五年，不夠僑生資格，若回台參加聯考，又恐課程不銜接，難於考取。故只得留在香港，不想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先生晚年常謂，一生所住最久之地方是香港。

先生於民國五十三年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聘，為新亞研究所導師，並授大學部課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歷史地理」。六十七年退休，轉任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至七十年始離開中文大學。

先生初到香港至逝世為止，一直擔任新亞研究所之導師，新亞研究所是先生任事最久之機構。民國六十三年，新亞研究所脫離香港中文大學，先生雖是中大專任教授，仍兼任新亞研究所導師，且是義務兼任，在中文大學退休後始領新亞研究所之薪給。先生在新亞研究所教授之課程先後有「中國中古政治制度研究」、「三代兩漢人文地理研究」、「中國中古史料研究」、「中國中古史專題研究」、「魏晉南北朝人文地理研究」等。

先生曾兩次到美國研究講學：民國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以訪問學人名義在哈佛大學研究兩年。民國

²⁶關於嚴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一事，本文所撰所引，完全依據嚴先生之《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80-84。

六十八年春，以訪問教授名義在耶魯大學講授唐史半年。據謂先生為第二位在耶魯大學用漢語講學之學人，第一位是錢穆先生。

民國五十九年，先生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年五十四歲。

先生性情隨和，毫無架子，沈默寡言，學生到研究室請教，問題說完，常兩人對坐無言，靜默幾分鐘，但卻不會令學生有一種壓力的感覺。又學生提出的問題，先生常說「此問題我沒有作過研究。」就不再說話。徐復觀先生²⁷與先生不同，徐先生常說「此問題我沒有作過研究，我試講我的意見，不一定對，你可作參考。」故徐先生對學生之啓發，較先生為多。

先生在其《治史經驗談》中，講治學要訣，其中兩點是「勤」與「恆」。²⁸在農圃道新亞書院，先生的勤與恆是出名的。一年到頭，除了農曆過年的幾天在家接待來拜年的學生外，每天都清晨到校，整日工作，極少與同事交際應酬。其對學術之熱誠給與學生最有效之教育。先生無口才，其講課吸引力不大，反不如仔細讀其著作。但先生之勤恆身教，則惟有親炙之學生才能體會，見賢思齊，追模師範。現在台灣香港仍有些學校不設教師研究室，教師在自己家做研究，只在課堂與學生接觸，對學生無疑是最大之損失。

數十年來，先生堅持不擔任行政工作。唐君毅先生為新亞研究所所長時，請先生擔任教務長，先生堅辭。後唐先生謂先生名大，新亞研究所新脫離中文大學為私立學校，欲借先生之名，先生為教務長可不治事云云；先生不得已同意暫代半年。唐先生逝世後，新亞董事會在數次所長易人時都以先生為首選，先生都堅不答應，然亦數次短期代理所長、教務長。先生不擔任行政職務之理由有二：先生自以為非幹才，負責行政恐尸位誤事。其次先生以為行政工作費時傷神，必耽誤研究。

先生德配段畹蘭夫人，生子曉田，女曉松，俱留學就業美國。夫人體弱多病，家事以先生之操勞為多。先生自結婚後，即奉養岳母，岳母隨先生一家自四川到南京、台灣楊梅、南港、香港。一九七二年夏卒於香港。又先生之外孫女黃小菊，稚齡自美國返香港依外祖父母，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撫養外孫十餘年，於枯燥之研究生活，增加不少麻煩與樂趣。小菊親外祖父母更甚於親其母。民國七十三至七十五年，先生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夫人因照顧在香港唸書之外孫，故先生一人獨居南港兩年，先生並謂無家事之麻煩，工作之時間更多。小菊初中畢業後，始返美國讀高中。

先生五十多歲後，有血壓高及中耳不平衡之疾病，服藥控制。民國八十四年初，《史語所集刊》傳

²⁷徐復觀先生自民國五十八年到香港新亞研究所任教，至七十一逝世乃止。

²⁸參見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40-148。

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先生謂其一生事業學問，受惠於傅斯年之識拔，因謂「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每天工作至午夜，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至深夜二點多。²⁹先生自年輕時起，養成習慣每天早睡早起，從不開夜車趕工。³⁰今以近八十之年一改數十年之習慣，故文章寫完之後幾天，大病一場。此後常走路不穩，站起會頭暈。此年暑假，先生與人談話，下巴會不由自主地顫動，醫師謂有輕微的帕金森症狀，腦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醫療與檢查，無甚大效，時好時壞。八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夫人、小菊奉先生飛台北，到三軍總醫院看神經內科門診，住院做各項檢查，報告謂有輕微帕金森症，腦微血管部分堵塞，服藥幾天之後，情形大好，七月初出院。七、八月醫師慢慢調整先生之藥量，八月初醫師降低藥量，先生頭暈之疾又發。後藥量又調整，故九月份情況又見好，夫人且決定再看幾次門診，於十月底回香港。誰知十月五日（星期六）晚六時三十分左右中風，一直昏迷不醒，送台北市忠孝醫院加護病房，至九日下午四時四十分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綜觀先生一生，讀書研究，著作教學，單純專一，離權遠勢，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為一健康純淨之「學術人」。先生臨終前一星期，自覺健康已恢復，謂返港即撰寫《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冊之最後一篇，及完成《中古佛教地理》一書。可謂為學術研究至死乃休。

先生作研究有計劃，按部就班，效率甚高；又勤而有恆，心無旁騖，故其學術著作之數量，近代學人罕有其匹。計有專書七種（共十六冊）、論文集二種（二冊）及論文四十三篇（改訂編入專書及論文集者不計，重複者只計其一）。³¹

先生之學術成就大致可分二方面：政治制度史、歷史地理。

其一、秦漢至隋唐之政治制度史。對中央制度及地方制度的研究都有重大貢獻。

1、對中央制度之研究成績，計有專書《唐僕尚丞郎表》四冊及論文十餘篇，從有關史料中，一點一滴蒐集有用材料「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化，講出大問題、大結論。」所以每篇論著都對一至多個重要問題提出有力答案。下舉三篇論文及《唐僕尚丞郎表》以見之：

²⁹參見李啓文：〈經時緯域寫人文—歸田師晚年生活小記〉，載《嚴耕望先生追悼會紀念冊》，頁12，香港：新亞研究所，1996年10月。

³⁰先生謂唯一的例外是在美國哈佛大學為訪問學人之二年，蓋哈佛大學之中日文圖書館所藏日文書對其研究西北邊疆之地理極有用，「故臨時參加學生行列，去學日文，趕看日文書，因為時間有限，往往讀到深夜兩三點鐘」。見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46。

³¹先生著作之最完整目錄，參見李啓文編，《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頁251-272，稻禾出版社，1997年12月。

〈秦漢郎吏制度考〉：縝密詳細全面地考察秦漢時期之郎吏制度，統計郎官之出身、遷昇。指出秦漢百官，絕大多數出身郎官。秦及西漢初，郎吏之進身多由蔭任與訾選；武帝創孝廉、甲科除郎之制，此後民間優秀份子有進身之階，加強官員之新陳代謝，擴大政府之社會基礎。「除郎新制實有漢一代國家機構之大動脈，政府生命之活泉源，而郎署則此泉源匯儲之所也…惜乎東漢中葉以降，此種以郎署為工具向民間吸收新空氣增加新血輪之優良制度為達宦世儒所把持，致政治社會又逐步僵化，遂啓魏晉南北朝世家門閥之漸。」³²郎官是宮庭宿衛之小官，先生對此小官之研究，考出秦漢至南北朝數百年政權社會基礎之演變，正是研究小問題，得出大結論之典範。

〈北魏尚書制度考〉：自東漢以下，中央政府之行政中樞為尚書省。《魏書·官氏志》記載尚書制度過略，《唐六典》作者已不詳其制。先生根據《魏書》，蒐錄所有曾在尚書省任職之官員，考證其年世，遷昇途徑及其在任之工作，按時間、部門排列，結果是「北魏前期尚書制度的演變歷歷在目，且與漢化的進程完全契合，而孝文帝建制六部三十六曹，所無考者只有兩曹郎中而已。北魏一代的重大制度於此大明。」³³

〈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³⁴：自漢末以來，尚書六部與九卿之職權常似重複混淆。唐世亦置九寺諸監，職掌似與尚書六部重複。經安史之亂，制度大變，唐中葉以後，學者已多不知開元以前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實際的職權。先生從行政學的觀點研究當時史料，提出多方面之證據，考定尚書六部秉承君相之制命，草擬政令，頒下寺監，並督促其施行。尚書六部為上級之政務機關，寺監則為下級之事務機關。此文之後部又考論尚書省職權在唐代後期之演變。此文解疑去惑，發千載之覆。

《唐僕尚丞郎表》四冊，凡一千零九十一頁。本書為先生研究唐代尚書省重要官員之力作。第一冊卷一述制，述尚書省之組織、職權及其演變。卷二至卷四為通表，唐代之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六部尚書、侍郎及度支使、諸道監鐵轉運等使全部入表，並附以拜任、昇遷、貶官、兼職等詳細資料，共有一千一百一十六人，二千六百八十餘任。卷五至卷二十二（後三冊）是輯考。用以詳細注釋第一冊之通表。蓋史料謬誤、互相矛盾或隱晦不明，通表所列，多須曲折之考辨。先生於此書「序言」曰：

「孫逖〈吏部尚書壁記〉（《全唐文》三一二）云：自有唐之初至開元二十一年李嵩任職，凡四十八人。今檢余所考得之人任，自武德元年之李綱迄李嵩，凡五十三任，就中侯君集、高士

³²見前引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330-331。

³³見嚴耕望：《治史經驗談》，頁85-86，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四年。

³⁴嚴耕望，〈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初刊《史語所集刊》第二十四本，頁1-68，台北，民國四十二年），載《唐史研究叢稿》，頁1-101，香港，新亞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

廉、韋安石皆再任，宋璟三任，實得四十八人，與孫記恰合。」³⁵

可見此書之考證，非常精密準確。此外，此書考證發現唐代重要史籍之錯誤凡一千二百餘條。

唐代前期尚書省為宰相機關兼行政機關，後期仍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尚書省之左右僕射、左右丞、六部尚書及侍郎，不但本官華貴，即凡朝廷顯達莫不曾歷此任，至於宰相翰學尤多以此官兼充，故能盡括朝廷顯達之全部者，實莫過於此。」³⁶唐代為中國史上之大時代，宰相、翰學、節度、觀察、郎官、御史，乃至科舉中式者，或當時有提名，或後人有補表，反而行政中樞之尚書省重要官員無著錄。先生此表，可謂補充此缺陷。本書成為研究唐代政治史之基本參考書。

2、對地方制度之研究成績，計有專書二種：《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初版二冊，二版三版改為一冊）、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二冊）。今簡介其貢獻如下：

《兩漢太守刺史表》³⁷一冊，三百二十四頁。本書為先生研究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之副產品，兩漢可考之州刺史、郡太守人選依時代先後排列為表，為研究秦漢地方制度之有用參考書。有學者據本書作統計，以研究漢代之人事任用及人文地理。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³⁸一冊，四百四十頁。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³⁹二冊，九百二十頁。地方行政制度之範圍包括地方行政區劃，各級地方政府之組織、官吏之職權、任用及昇遷之途徑、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關係。地方行政直接影響人民生活，關係歷代治亂興衰最大，是中國歷史之重要構成部分。然中國歷代史書，對於政治制度之記載，都偏詳中央政府，而忽略地方。近代政制史學者之著作，亦患此疾。先生此書是第一部有系統詳細研究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專書。

³⁵ 見嚴耕望撰：《唐僕尚丞郎表》，「序言」頁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六，台北，民國四十五年。

³⁶ 參見前引《唐僕尚丞郎表》，「序言」頁1。

³⁷ 嚴耕望輯：《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商務印書館發行，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初版。（民國八十二年二版，增「序言」及「目次」，內容亦有修正增補，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發行。）

³⁸ 嚴耕望撰：《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二冊，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台北，民國五十年（二版合訂為一冊，民國六十三年。三版改名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一冊，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A，台北，民國七十九年。）

³⁹ 嚴耕望撰：《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中《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二冊，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台北，民國五十二年。（二版，民國六十三年。三版改名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二冊，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B，台北，民國七十九年。）

本書特色之一，是運用大量石刻史料以證史。以前亦有學者研治碑刻。但僅作人物傳記資料。擴大碑刻之用途，用作研究制度史之史料，先生可謂是第一人。因前代史家忽略，歷代地方政府之次要官吏，幾不見記錄，各級地方政府之組織僅見其大略。先生運用大量石刻史料，尤其是地方長官之碑陰屬吏題名，重建秦漢至南北朝各朝之地方政府組織。秦漢至唐代地方制度之演變，乃了如指掌。如東晉南北朝府州僚佐兩系統制度之消長更替：州刺史之屬吏承漢制，盡用本地人，由刺史自除。而刺史加將軍開府置僚佐，由中央任命，府佐系統漸奪州吏之行政權力，地方行政權乃全歸軍府，州吏系統成爲閑散冗官。隋文帝廢鄉官，乃廢除已成冗員之州吏系統，其事似無關緊要。實則此制度演變之考證，顯示漢代地方政府屬吏由長官自置，演變至隋唐及以後地方政府之屬吏由中央政府任命。此一巨大變化，前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先生考明之。

本書特色之二是運用細密之歸納法，從很多零散之史料中歸納其共通之處，而重建不少僅存其名之制度。如漢代地方官吏之籍貫限制，史籍不言其事，先生窮極蒐羅，用漢代二千多任地方官吏之籍貫作統計，得出結論：此制始於武帝中葉，除京師特例外，各級地方官及監察官不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國守相不用本郡人，縣令長亦不用本郡人。尙有其他細緻結論不贅。又如魏晉南北朝之都督、軍鎮、行台、護軍、領民酋長等制度，前人僅知其名，先生之考證，使上述制度重見天日。

其二、歷史地理之研究成績：專書《唐代交通圖考》一種，前五冊，凡一千七百九十二頁。此書考釋唐代交通路線及交通制度，計劃分京都關內區、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山劍滇黔區、河東河北區、河南淮南區、江南嶺南區、河運與海運、交通制度、綜結等十冊。前五冊已出版，第六冊河南淮南區已完成尙未結集，第七冊以下，或僅撰一、二篇，或全無撰寫，故此書爲未完成之著作。此書已出版之五冊，每冊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線或一地區之交通路線。不但研究驛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文中詳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理形勢、物產、所經過之城市、鄉村、關隘、橋樑、驛站、寺廟等，甚至某處路旁有一奇特之大樹，亦根據資料描述。並附論與該道路有關之歷史事件。再者，爲幫助讀者了解，每篇文章都附有一幅或數幅由先生親繪之地圖，先生所繪之地圖對歷史究工作者非常有用，蓋至今尙無一本精確而比例較小之中國歷史地圖。

先生撰此書，幾盡用唐代之文獻：「諸凡正史、通鑑、政書、地書、別史、雜史、詩文、碑刻、佛藏、科技、雜著、類纂諸書，及考古資料，凡涉及中古交通，不論片紙巨篇，搜錄詳密。」⁴⁰可謂「竭澤

⁴⁰見嚴耕望撰：《唐代交通圖考》，「序言」，頁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台北，民國七十四年。

而漁」。先生自謂此書為其「生平功力最深、論辯最繁之述作。」⁴¹又謂此書之「內容所獲尤非事先所能想像，舉其大端，」有如下十點：

「松潘高原，向視為荒蕪境域，人跡罕到；乃其實，自漢末南北朝以來，岷嶺、松潘草原即為西北河湟青海地區南通長江流域之一要道。唐置館驛，南通成都，東接散關，北達河隴，為唐與吐蕃必爭之地。此其一。

唐蕃兵爭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區，蓋地形所限，兩國交通惟此為坦途也。故唐人於此極力經營，州軍鎮戍星羅弈布，前人皆矇然莫辨。經此詳考，當時唐蕃兵爭之形勢，使臣商賈之進出，皆得按圖指證。此其二。

涼州（今武威）境域，兩宋以來，久陷荒殘，但於唐世，實為繁榮大都會之一，驛道兩線東達長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謂河西走廊，遠通西域。其道雖早有經營，但前人於此仍多茫然，岑仲勉先生云，『漢唐在玉門以西未見驛傳之記載。』此非一人之見也。乃其實，唐代驛傳之推行遠達安西（今庫車）、北庭（今孚遠）以西諸屬國，唐代史志與唐人詩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瓜州常樂（今安西縣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兩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磧道，館驛名稱里距皆一一詳明；西州（今吐魯番東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 E89 40' · N42 50'）東西道上館驛名稱可知者亦數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驛，不始於唐。此其三。

長安北通河上三驛道，分達靈（今靈武南）、豐（今狼山、晏江間約 N41 · E 107 40' -50'）勝（今托克托西黃河南十二連城 E111 · N40 13'）三州，豐州驛使通傳長安不過四日餘，亦盡中古驛傳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鎮之天德軍（約 E109 · N41 之西北，今烏梁素海東北水濱），其地望久不能詳，近亦準確知之。且賈耽所記天德軍東通雲中（今歸綏、托克托間）之塞外道，為自古用兵之要道，後人無能明之者，亦得據今圖，考故事，一一證之。此其四。

唐與回紇邦交常睦，有豐州高關（今狼山口 E107 25' · N41 20'，或石蘭計口 E107 30' · N41 20'）、甘州居延海（約 E101 30' · N42 30'）、庭州特羅堡子（今北塔山南，約 E90 30' · N45 稍南地區）三道相通。此三道今雖不能詳，但大要途程可曉。且回紇入唐先取鷲鷄泉入高關至豐州，南下靈、夏（今白城子 E108 50' · N38），後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關東行繞經天德、振武（今歸綏、呼和浩特），取太原入長安，迂迴千餘里，是亦非研史者所能想像。此

⁴¹見前引《唐代交通圖考》，「序言」，頁2。

其五。

東北邊塞，居庸（今關）、古北（今古北口）、盧龍（東晉至唐道出青陘，蓋今青山口 E118 35' · N40 25'）、渝關（今山海關）四道並出，而取途不詳，今得歷歷指證。此其六。

飛狐（E114 35' · N39 35'）之險，久著史冊，而關隘之要，因時代而轉移，中古北魏前期，尤為入塞之第一要道，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門反居其次，此寓有經濟、歷史、地理之意義，非一般讀史者所能想像得之。此其七。

劍南邊區，諸道並出，而通南詔之青溪、石門兩道為著，此蠻書已著錄者，前人考研，頗失粗疏，今皆詳為比證，事乃大明。此其八。

雲南通安南交州之陸道，前人論者多家，皆以今紅河線當之；實則取葉榆河谷，今盤龍江。此其九。

以上所言，皆邊區也。反顧內地，長安、洛陽為西東兩都，交通至繁，沿途館驛相次，榆柳蔭翳，軒騎翩翩，鈴鐸應和，固唐代之第一大驛道也。以云途程，必謂大抵與今隴海路相當，而實不然。自嶠山以東，南取永寧（今洛寧東北、三鄉鎮西北），東循洛水，與今道異，與漢以灑池、新安道為主者亦異。而兩都間計程八百餘里，置驛三十四五，今考其名號尚十得八九。他如長安太原道、洛陽太原道、藍田武關道、駱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荊襄道、太行東麓走廊道等，館驛名稱亦頗有可考者。凡此館驛多出於詩人之吟詠，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想像之外也。此其十矣。」

交通道路之外，此書內容涉及而大有創獲者，「如國疆，如互市，如軍鎮，如唐詩地理等」，今又引其「序言」，僅述此書考證唐代西疆、北疆之貢獻：

「古代國疆，載籍模糊，前人繪圖，多以意為之，不得已也。但至唐已可略考。乃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圖》之《唐地理志圖》，竟繪唐代西疆止於瓜（在沙州東）沙（今敦煌），其西北之伊（今哈密）、西（今吐魯番東七十里阿斯塔那南）、北庭（今孚遠北二十里破城子）皆摒於唐疆之外。按安西（今庫車）、焉耆（今縣）各自為國，中央僅置鎮戍，為之統攝，…非中國之正州，摒歸藩屬，不入版圖，猶自可也。但其東之伊、西、北庭三州，乃唐室正州，在《括地志》三百六十州之列，《通典》、《元和志》、《唐書》〈地志〉亦在版圖，其行政領縣視瓜、沙以東之正州絕無差別。庭州最西領縣為輪台，在州西四百二十里，約今阜康縣（E87 56' · N44 10'）地區，西州最西領縣為天山，在州西一百五十里，約今托克遜（E88 35' · N42 48'）地區，唐有西州、庭州幾三百年，故唐代西疆最保留之擬定當在今迪化西山，與天山南支

之阿海泉山口（約 E88 30' · N42 30'）。宋祖玉斧一劃，盡棄大渡河以南之地，壯士斷腕，勢不得已；楊《圖》何竟率筆一揮，棄地幾三千里！自後日人箭內互編《東洋讀史地圖》，一承楊《圖》，瓜沙以西皆屬蕃界，國人依樣葫蘆，一仍舊貫，宜乎俄人謂新疆自古未入中國版圖矣！可為一嘆！

余詳考交通，必涉國疆所屆，凡所考獲，指證分明。例如北疆，自迪化而東，循北塔山脈（N45 · E90 -93）至吉奇吉奈山脈（N45 · E96 -99），此唐代北庭通回紇道所經之國界也。又東微南，至戈壁阿爾泰、諾顏博格多山脈（約N43 · E101 -105），即唐史所謂花門山也。居延海北三百里之花門山堡（約今鄂博圖廟 E101 25' · N43），蓋居延道中唐疆之最北鎮戍，杜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已非」，此其地矣。又東鶯鶯泉（約今烏尼烏蘇 E107 30' · N41 45' 至貢噶泉 E106 10' · N41 30' -40' 地段）、木刺山（天寶間置橫塞軍，約今烏拉特中旗 E108 10' · N41 50' 地段）、黑沙城（約今烏拉特後旗地段）、諾真水汊（今百靈廟 E110 28' · N41 40'）此四地皆當磧口，屬唐境；其北屬突厥、回紇。又東雲州（今大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殆今烏蘇木海子（E113 15' · N40 50'）地區。又東至大寧城（今張家口 E114 45' · N40 45'）北數十里，又東包禦夷故鎮（今獨石口、雲州堡之正中間，約 E115 45' · N41 10'）；今馬尼圖山脈東至獨石口外之長城，蓋即唐之國界歟？禦夷鎮塞外之冷陁山（契丹名炭山）即奚王避暑牙帳矣。又東南度雲嶺，一名墨斗嶺，唐置墨斗軍，在柳河（今伊遜河）西二十里，灤河北岸（約 E117 30' · N41 ）。柳河即唐、奚國界也。又東北營州（今朝陽）西北百里有松陁嶺（約今朝陽西北大青山 E120 5' · N41 40' 處）；其西奚，其東契丹。而秦長城在此北二百里外，視唐疆為遠屆矣。營州東出驛道，經燕州（今義縣），巫閭守捉城（約今北鎮），渡遼水至安東府故城（今遼陽）。城西北、東北八十里皆契丹境。蓋驛道線之北不遠處亦皆契丹境。以上所陳，皆唐代長時期穩定之北疆。就中除北庭通回紇道中之國界稍涉推測外，餘皆有實證，不可易。

凡此百端，皆詳徵史料，悉心比勘，精辨細析，指證詳明，俾後之讀史治史，凡涉政令之推行，軍事之進退，物資之流通，宗教文化之傳播，民族社會之融和，若欲尋其徑途與夫國疆之盈虧者，莫不可取證斯編。」

此書為研究唐史有用之工具書。又交通路線，古今相沿為多，此書亦可作為研究唐代前後各朝之參考書。

《唐代交通圖考》以交通路線為研究之主軸，旁及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宗教、文化各方面。

先生計劃研究國史人文地理，其子計劃依次是《唐代交通圖考》、「唐代人文地理」、「國史人文地理」，「由小到大，由專而通」。⁴²今《唐代交通圖考》雖不得完稿，「國史人文地理」僅撰文十二篇，⁴³然其開創以地理觀點研究中國歷史，則已展示其方向與方法。傳統之歷史地理，「主要就沿革地理（政治地理）而言」，今先生之研究方向，「推展到經濟、社會、宗教、文化各方面，欲從人文地理角度窺探全史，這是舊歷史地理學的延伸。」⁴⁴可謂是擴大了歷史地理學之範圍，或者說開創了新的學術領域。

先生對學術之另一項貢獻是《石刻史料叢書》⁴⁵之編輯。在數十年歷史研究過程中，先生利用大量石刻史料重建不少已經湮沒之史實制度，深切了解碑刻之史料價值。碑刻文字星散而數量甚大，甚不方便利用。先生乃選擇史料價值較高者，制作一目錄，交由嚴一萍先生蒐集出版，凡甲、乙兩編：甲編收錄碑刻文字，乙編為目錄、跋尾。計凡六十函，三百四十二冊、九百六十九卷。先生為此叢書作一長序，詳論石刻史料之史料價值。此叢書是一部方便利用之史料匯編，嘉惠學界，自不待言。

先生的著作都是以考據為根本。胡適之的提倡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先生是真正的實行者。

先生的著作偏重於資料之系統化匯集，有兩部專書是表，即《兩漢太守刺史表》與《唐僕尚丞郎表》。蒐集所有相關之資料，分類編排，若材料互相沖突，則考證分析，去誤存正，妥當安排於表中，成為漢唐政治制度史之工具書。又如《唐代交通圖考》，亦是蒐集所有能見到之資料，嚴密考證得出結論，其考證欲得歷史之真實，而不以建立理論為目的。既不立理論，除非有新資料之出現，則其考證無疑有較長久之價值。

先生之著作偏重歸納法之應用。蒐集所有能見到之資料，以歸納法抽繹其共通性，往往有重大發現，如前文所述之漢代郎吏制度、地方官之籍貫限制等是。可以說是無意立理論而理論自出。

先生之著作，都是專家之學術論文，考論深奧，且引文多，以至枯燥無味，大概只有專治政治制度史及歷史地理之專家才會卒讀，所以盡管先生之成就很大，但在歷史學界之外，了無名氣。

先生以為史學之研究，應就問題之性質、史料之狀況，構思適合之方法，以解決問題；又選擇最能

⁴²參閱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39。

⁴³《國史人文地理》十二篇之篇名為：〈戰國學術地理與人才分佈〉、〈唐五代時期之成都〉、〈唐代成都寺觀考略〉、〈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兼論秦統一天下之背境〉、〈唐代戶口實際數量之檢討〉、〈齊長城地理考異〉、〈唐代北疆直接領轄之境界〉、〈中國史上經濟文化之地理的發展〉、〈南北朝三都人口數量之估測〉、〈南北朝時代五台山之佛教〉、〈唐代長安人口數量之估測〉、〈元和志戶籍與實際戶數之比勘〉。此十二篇文章之出版資料請參閱李啓文編，《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

⁴⁴參閱前引|《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47。

⁴⁵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

表現所研究問題之文章體裁，以方便讀者，顯示成果。先生所撰《治史經驗談》，舉研究之實例，述研究之方法，切實可行，易於學習。台灣有以此書為「史學方法」之課本者。今簡介先生治史方法之若干點特色如下：⁴⁶

一、人類社會的發展，前後連貫不斷；某朝代之制度或所發生之事件，不少淵源於前一朝代，而結果影響可能要到下一朝代才能看得清楚。史家為求方便，以朝代為分界作斷代之研究，只專於某一朝代並不能深刻認識該朝代。一般來說，對越長的時期下功夫，越能清楚了解史事之前因後果。所以先生認為研究一個朝代，最少要對上一朝代及下一朝代都下功夫，即要懂得三個朝代。先生研究秦代至唐代，對先秦史料非常熟，且寫過一些論文。而先生對《宋史》，也曾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認真讀過一次。⁴⁷

二、不要作「點」的孤立研究，而要作「面」的研究。即是要研究包含很多小問題的大題目，就大題目一次閱讀史料，抄錄有用之史料，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如先生研究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其中包含都督府建置、州府僚佐、郡縣制度演變、北魏軍鎮、領民酋長、諸部護軍、北周總管等大問題與其他眾多之次要問題。讀書抄資料時注意大範圍之所有問題，抄錄所有問題之有關資料，計由讀書抄資料到撰寫完成，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把上面的問題都徹底研究，而對魏晉南北朝時代亦有全面之認識。若是用一般人的方法，對各問題作獨立研究，做每一問題，都要將魏晉南北朝所有的書看一遍抄資料，然後動筆，最少要一年半的時間。做第二個問題，又要重新看書抄資料，又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把各問題分開研究所費的時間加起來，一定比一口氣同時處理整個大題目的問題群所用的時間要多得多，而且研究單一問題，每次看書只是翻需要的材料，研究結束，對整個時代可能仍沒有一全盤的認識。再者，作全面的眾多問題的整體研究，容易發生材料中的矛盾而隨時糾正。

三、對於所研究範圍的基本史料，如該朝代的正史，要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閱讀，這樣不但對該朝代有一全的了解，蒐集資料時，某些隱蔽有表面不相關卷頁中的資料，也不會遺漏。若僅就單一題目去翻資料，往往會錯過這類資料。此外，認真一字不漏地閱讀基本史料，可以增加很多知識，學問潛力越來越大，中年以後，會四處通明，對很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

四、把學問建立在舊史料上。舊史料人人能見，而且全面，是研究歷史的基礎。新發現的史料雖然

⁴⁶以下所言各點，請參閱《治史經驗談》頁1-30。

⁴⁷先生因對《宋史》下過深功夫，比較唐及以前各朝史料與宋朝之史料，認為宋代之史料多，只要勤加耕耘，必有豐盛之收穫。故先生五十多歲後，常鼓勵學生治宋史。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學生潘國鍵考上碩士班，先生打電話叫書店送一套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的二十五史版《宋史》到新亞，送給潘君，鼓勵他治宋史。此事余所親見。其後先生所指導之新亞研究所研究生治宋史而較有成績者，有治宋代歷史地理之李潔華，治宋代政治制度史之謝興周。

珍貴，但不易得，而且新史料都是片面的，殘缺不全。只有對舊史料熟悉，才有能力去利用新史料；否則即使有幸見到新史料，也不知是何物，更談不上利用。先生說歷史研究應是「看人人所能看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能夠看到新史料是福氣，但歷史研究不能僅靠福氣，否則沒有新史料，就不能再做研究？此與過份強調新史料之重要性，忽視舊史料，乃至壟斷新史料，大異其趣。

先生治史好立計劃，此為其取得豐碩學術成就的關鍵之一。蓋有計劃始有用力之處，否則此處做一點，彼處做一點，不成系統，費時無功。計劃已定，則按部就班依計劃進行，研究工作持續不斷，永無不知做什麼好的時候。先生之計劃規模宏大，涵蓋面廣，作全面深入之研究，嚴密考證而通貫上下左右，故創獲多。然亦可知先生初立計劃之時，並不知計劃完成將有多少創獲。如先生在民國三十五年開始進入唐史之領域，計劃研究唐代交通時，對唐代之交通所知甚少，為此尚詢問勞幹先生有關陳遠元所撰之〈唐代驛制考〉。⁴⁸決定計劃後，即全面閱讀唐代史料，抄錄卡片，二十年後，於民國五十六年始動筆撰寫，至今出版前五冊，第六冊亦已完成待刊，合近二百萬字。對唐代之統治領域、各地區之交通路線、經濟、文化狀況之考證，挖掘出甚多前人所不知、所誤解之史實。先生初立計劃之時毫無成見，其創獲是據史料經全面精密之考證而建立，客觀程度大，較近歷史之真象。此為史語所學風之典範。

⁴⁸參見嚴耕望：《治史經驗談》，頁81，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年。